

## 林纾及其林译小说

摘要: 林纾及其林译小说一直是中国文坛的热点话题, 但对他的译作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笔者拟用新世纪的新的翻译理念从翻译态度、归化与异化倾向以及他的译文与变体翻译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审视这位翻译界的前驱及其译作。

关键词: 林纾; 归化; 异化; 变体翻译

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非常典型的人物。他自幼嗜书如命, 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 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更得世人称道的是, 他不谙外文, 却借他人之口、用娴熟、精湛的古文为国人翻译了 180 余部的西洋小说, 于清末民初风靡一时, 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学界对林纾的研究在 80 年代曾经比较热闹, 其中许多文章围绕林译小说而作, 但褒贬不一, 莫衷一是。近的一二十年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这一话题。近几十年来, 中国译界引进外国论著及观点, 在译学观点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译论方面也比先前丰富了许多, 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新世纪以新的翻译观来重新审视这位充满矛盾的人物。

译书是一项爱国实业

综观中国几百年的翻译史, 大多数翻译家并非纯粹从事翻译, 而是多项工作兼而有之, 在他们丰硕成果的背后总有一种信念在暗暗地支持着他们。林纾一生爱好琴棋书画, 著有小说、史传不下百种, 译书 180 余部, 那么, 在短短的 20 多年里, 是什么信念支持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译出数量如此可观的西洋小说呢? 是他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林纾不是一名血战沙场的爱国将士, 但马江战役后他奋笔疾书, 向钦差大臣控告何如璋的贻误战机; 为甲午海战死难将士拟写《甲午海战覆盆录》; 每每与朋友商讨新政, 指摘时弊……这些都无不表明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作为一介书生的他无以报国, 但又不希望国人屈服于外国的奴役, 便潜心探究国人为何不能与西方人抗衡, 得出原因在于“欧人日励于学”, 而亚洲人“终日昏昏沉沉”(《清议报》1900 年“译林叙”一文)。他认为“开民智, 新亚人耳目”是当务之急。在“立学堂”、“作演说”和“译书”之间, 他权衡再三, 选定译书为实现“开民智”的最奏效的办法。于是, 他决心“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 为劝喻之助”(《爱国二童子传》达旨), 将译书作为他报国的“事业”。他的愿望是通过译介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 他意识到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 并奋起保家卫国。他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他的译书动机。《汤姆家事》的序跋中, 他谈及自己的译书动机是“触黄种之将亡, 因而愈生悲怀耳。”“余与魏君同译是书, 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 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实际上, 这一动机一直贯穿着他的译作。1908 年他翻译的《玃司刺虎记》、1911 年翻译的《保种英雄传》等译作都源于此。林纾对译作的选择往往考虑时局之需, 在他译介的 180 余部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 《汤姆家事》(《黑奴吁天录》)就是通过讲述书中在美国农场里受虐待的黑奴来影射与控诉美国当局对华工的暴行, 以此警醒国人;《辛丑条约》签定之后, 他为了敲响“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的警钟, 翻译了《雾中人》一书; 林纾慨叹“自己不能任兵”, 却希望通过翻译《埃司兰情侠传》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据张俊才先生收集整理, 林纾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著作、小说, 还有外国评论的翻译。林纾一生翻译了 57 篇外国人的论文, 其中有 28 篇都是外国人评论中国时局, 研究中国内政的文章, 如《论中国盐税》、《论中国宪法》、《论中国破产》、《论山东铁路情形》等。从以上的众多例子中不难看出林纾为唤起国人警醒、为完成他的爱国事业而煞费苦心。

林纾著译中的异化和归化现象

异化与归化是翻译过程中解决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差异的两大基本模式和方法。柯平认为, 归化翻译倾向于用带有某些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语词语, 通常做法是: “撇开原文的词语与句法, 抓住其语用意义, 从译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而译之” [1]。相对而言, 异化则更多地是在译语中引进原语的表达方式。

林纾著译过程归化倾向与异化倾向兼而有之, 但总的来说前者大大超过了后者。这应归因于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清末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私塾教育, 学的是《四书》、《五经》、《史记》……, 争的是通过八股文考试入仕当官。由于从小受古诗文的熏陶, 林纾特别热衷于诗文, 在他的教学中也采用平

日熟读的《史记》《汉书》为教科书。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纾译文文字表述形式的文言化。以色列特拉维夫派的著名学者 Evan - 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林纾译书的归化倾向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如果某一文学多元系统十分强大,使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往往会采取归化式(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而如果翻译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一个主要地位,译者则多采取异化式的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2]。林纾所处的时代仍属于封建王朝社会,长期以来,国人都认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然也应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央大国的意识早已根深蒂固,人民只相信中国有辉煌的文化,而全面否认了外国的文学及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文学的地位自然是处于劣势(这一现象是有事实可考的:当时社会对外国文学作品以及对翻译持蔑视的态度,以致于林纾与王寿昌在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都避免用他们的真实姓名,而是用笔名:冷红生和晓斋主人)。林纾在思想上的归化倾向决定了他在译书过程中所采用的归化的翻译手法与技巧即意译[3],林纾的译文“全然不拘于原文的句、段”,他认为掌握全文的大意是翻译的关键,在《译林叙》中,他明确提出:“华洋文字,体本不同。更易门面,篡削字句,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凝,反或冗晦。”但他的译作却能生动、如实地传达原文的风格情调。究其原因他始终恪守中国古文文论精髓——“讲意境、守义法”。在他看来,“意境义法概置弗讲者为庸妄”、“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4]。换言之,林纾认为翻译小说不在于讲究具体的字句上一一对应的翻译,而是重在传达小说的意境与整体的神韵,让译本读者体验与原本读者一样的感受。处在一个社会、文化观念转型历史时期的林纾并不完全保守封闭,他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在翻译思想倾向上由归化向异化转变:在译文序跋中,他提倡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后悔自己不谙外文,认为学习外文对翻译、对国家都极为重要,于是便“敦喻诸生,极力策励其恣肆于西学”,将“中西二文溶为一片”;他还把当时出版的一切外国书籍的译本买来阅读,为的是更好地熟悉外国作品的风格与写作技巧;译介完成数部外国小说之后,他深感西洋小说“内容新鲜,作法奇妙”,甚至曾经说过要采用哈葛德和迭更斯先生的笔法写小说;除此之外,林译小说中不乏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拍卖情节中,林纾多次用音译的“弗郎”代表法国货币中 franc(法郎);另外还出现了至今都通用的“礼拜”一词代表 week(周,星期),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如地名“拉非德”,人名“马克格尼尔”,“亚猛”,“汤姆”等等。从归化和异化的不同倾向中,我们见到了一个集矛盾于一身,不断完善自己的转型时期的林纾。他囊括了中英文两种语言的精华以及其他译家的经验,译介出了许多有助于国人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使中国近代翻译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林纾译作与变体翻译

黄忠廉先生于 1997 年这样给变体翻译下了定义:变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也就是说,翻译的范围是广袤而深远的,它不是一个教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种具有一定特定目标(即译成的可以让读者顺利接受的译作),却可以通过不同手段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变体翻译相对于全译来说为译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它在解放译者的同时,也将读者从繁重的全文阅读中解脱出来。变译早在 17 世纪的英国就曾出现——翻译家德莱登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译罗马诗人维吉尔《伊尼德》都有删节,中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采用的就是摘译。当今,信息量的飞速增长再也不允许人们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详细的翻译或阅读。较为有效、快捷的摄取信息的途径就是阅读一些经过浓缩处理的译作。这样,读者既能从中了解作品的全貌和整体感觉,又可以节省时间。这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对翻译提出的新要求。应此需求,变译得到大力的提倡,渐渐成为新时代的翻译新理念。

回顾几十年来译界关于林译小说的评判,虽然大多数评论家对林纾译书的爱国动机、惊人的译书速度、浅显明了的译文效果持一致肯定的态度,但总的看来,否定的观点占了上风。批判的重点集中于:译文中随意添油加醋,用字冗赘;内容上删节很多,在作品体裁上也加以改变,以致于失去了原文的“美与风格”。但黄忠廉先生在《翻译变体研究》一书中的一段文字从另一方面给我们很大启示:“纵观翻译史,对原文信息总体上不增不减的翻译应该说是世界翻译运作的主流,但不乏对原作有增有删、加入己见、有

评有写、甚至是偷梁换柱之作。细读上个世纪之交的严林译作，不难发现主流之下淌着的暗流。”在了解变译的定义和特征后，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原文的增删，或是原文与译文体裁的相异，都可将林纾的翻译归入“变体翻译”的范畴，而且称得上是成功的变体翻译。林纾采用变译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丝毫不谙外文，只能靠别人的译述来完成译文。然而，他对小说的情感悟性极高，极易融入小说的情节，正如他在“《鹰梯小豪杰》叙”、“《黑奴吁天录》跋”等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及的他在译书过程中忍不住“且译且泣，或喜或愕，一时颜色不定，似书中之人。”读到关键之处，则“即吾亲切之凄婉，遇难为悲，得志为喜。”由于他入境快，把握全文的情感准，加上非凡的文言文表达能力，他的译作刻划的人物及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特别感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林纾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不讲自明的道理：译书很重要的是对作品有敏锐、深切的感受能力，全身心地投入，这才是取得佳绩的关键。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用“信、达、雅”的标准来衡量林译小说，将其译作一棍打死，给它们扣上了“不忠实于原文”的帽子。反之，笔者认为在多样化翻译得到承认的当今译界，林纾的译作应该得到重新评价和审视。

让我们先以删节的一些实例为切入点，来探明林译小说作为“变体翻译”译例的成功所在。林纾采用的翻译手段中“删节”是最为常见的，同时它也是林译小说被批评的焦点所在。林纾的译本从篇幅的长短上与其他译本有着天渊之别。如一共 44 章的《黑奴吁天录》，林纾的译本字数是 9 万 2 千多，而出自黄继忠先生的《汤姆大伯的小屋》（即《黑奴吁天录》）却有 34 万字之长；出自林纾之译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字数约 4 万 3 千多，而陈林、文光所译的《茶花女》译本的字数则达 12 万 6 千字左右。以上的数据足以证明林纾在其译作中采用的删节的频繁度。这些删节是否影响了读者对译作的总体感觉呢？让我们一起看看他译作中比比皆是的删节例子中的一个普通段落的翻译（《黑奴吁天录》的第八章第一段描述伊丽莎逃亡的译文）：黄继忠先生的译文是：

伊丽莎奋不顾身地逃过俄亥俄河，正是暝色苍茫时分。河面上缓缓升起了一片灰蒙蒙的暮霭；她一上岸之后，就完全消失在晚雾之中。波涛汹涌的激流以及大片横冲直撞的浮冰，在伊丽莎和身后的追兵之间，形成了一重无法逾越的屏障。因此海利只得沮丧地、慢吞吞地回到小饭店里去再作计较。老板娘为他打开一间小客堂，里面铺着一块破旧的地毯，地毯上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铺着一块发光的黑油布，周围有几把瘦长的高背椅子；壁炉架上摆着几个鲜艳夺目的泥菩萨，炉子里还微微有点冒烟；壁炉旁边放着一张硬木的长睡椅，显得地方很局促。海利坐在这把睡椅上，叹着人生多变，好景不长。

林纾的译文是：意里赛既脱险，天已向黑，海留犹怒立河岸视之，模糊不可复辨。然大河亘其前，万不能涉。因叹息至意里赛所住之逆旅，主人许店人除一舍处之。海留独居静念，以为天下事多捉摸不定。比较两段译文，林纾的译文明显比黄继忠先生的译文短。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他所采用的简洁的文言文，以及熟练驾驭古文的能力。另外，黄译文中笔者加上下划线的内容在林纾的译文中都被略去了。纵观全段的大意，这两处描写与本段的主要情节——“追踪”并无太大的关系，因此，它们的略去不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总体感觉和理解。反之，去掉了这些无伤大雅的旁支末节，林纾的译文显得更加清晰和简洁，同时也为读者节省了许多时间。在林纾译文中这样将一些与主题和中心没有很大关系的细节删去的情况是常见的，在笔者看来，只要它们不破坏原文的主要意旨，能保持原文的神韵，在译文中都是容许的。这样的译文效果也进一步证明了林纾的译文是成功的变体翻译。林纾译文中另一种常见的变译手段是“增补”。这些增补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根据译文的内容进行的延伸或者是通过一些文字描摹当时的意境。这些增补在以前的许多评论文章中都被认为有“随意增补”之嫌。在这点上，张俊才先生可谓独具慧眼，在 1992 年著的《林纾评传》中，他这样阐述：“这些增补经常是原文的基础上加上补充和润色……这些增补无疑使译文更富有意境美和艺术表现力。”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林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叙述马克在巴尼克温泉疗养区与公爵相识的一段译文：“无何，女公子死。公爵衔哀，不可以状。一日闲行堤上，柳荫浓翳中，见马克微步苔际，倩影亭亭，酷肖其殇女，大惊，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再看王振孙的《茶花女》中这一段的译文：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他仿佛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相比之下，林纾根据自己对原本主人公思想感情的把握，加入的一些细微、生动的描写字眼，如：“微步”、“倩影亭亭”、“酷肖”、“大惊”，将当时公爵的心情及周围的景致勾勒得惟妙惟肖。如此一来，林氏的译文比起王振

孙的译文就显得生动、传神，也更富有感染力。虽然变译与全译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但结果是一致的。林纾采用了这些变译手段可以说从大体上看并没有影响对读者传达原文信息的目的，反而，在许多地方使译文比原文来得更生动逼真，更吸引读者。于这点译界是有共识的：郑振铎先生曾以《孝女耐儿传》中描写市民妇女的译文为例，说明林纾能够将原作中最难表达的地方有分寸地再现出来。茅盾先生也认为林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与原文中的人物相比，几乎一模一样。

总之，无论是“删节”或“增补”，林纾遵循的都是：顺应中国人民的表达习惯和熟悉的表现形式使译文与原文从总体感觉上保持一致。林纾在翻译过程中更为注重的是读者的感受。这与现今的翻译界将翻译的评判焦点放在读者身上，提倡翻译要以读者为中心（reader - centered），考虑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反应是相一致的。时代在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新的时代已给翻译界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虽然林纾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懂外文而出现的某些讹误也确实存在，但我们不应因这些小的瑕疵而否定他译作的优点和价值，我们更有必要用新世纪的眼光来重新辨证地审视这位中国近代译坛的前驱，并正确地估价林译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翻译史上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柯平. 释义，归化和回译 [J]. 中国翻译，1993，(1).
- [2] 王东风.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 [J]. 中国翻译，2000，(4).
- [3] 冀刚. 林纾和他的译作 [J].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1).
- [4] 曾宪辉. 林纾文论浅说 [J]. 福建师大学报，1985，(3).
- [5] 薛卓. 林纾前期译书思想管窥 [J].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0，(5).
- [6] 张俊才. 林纾的其他翻译作品 [M]. 福建论坛，1982，(2).
- [7] 林薇. 林纾选集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8] 张俊才. 林纾评传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 [9] 曾宪辉. 林纾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 [10] 袁荻涌. 林纾与欧美名家名著 [J]. 学术交流，1994，(1).
- [11] 黄忠廉. 翻译变体研究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
- [12] 薛绥之，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